

城事论衡

ISSUES ON URBAN EVENTS

李程骅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事论衡

ISSUES ON URBAN EVENTS

李程骅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事论衡 / 李程骅著.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112-15493-7

I. ①城… II. ①李…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6846 号

本书以 21 世纪中国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战略行动为背景, 通过对一些重要事件、热点现象以及诸多新问题的剖析、评论和深入研讨, 来映射“城市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迁, 以展现中国加速推进城市化、城市转型发展, 以及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与企业国际化等重大行动的“历史镜像”。全书分为“战略定位篇”、“产城互动篇”、“创新驱动篇”、“文化传播篇”和“企业竞争篇”五大篇章, 力求将不同内容与体式的论文、评论和研究课题, 整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框架, 以丰富中国城市研究的话语体系, 为新一轮城镇化战略推进、城市转型升级行动和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提供实践创新的启示。

责任编辑: 施佳明 陆新之
责任校对: 党 蕾 刘梦然

城事论衡

李程骅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8³/₄ 字数: 380千字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ISBN 978-7-112-15493-7

(2408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言 城市中国：城事“论衡”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波澜壮阔的运动，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为之而变，全球城市体系和经济版图因此而改变，国内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建构，“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在促进区域发展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引领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放眼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都是建立在高度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以人与城市的和谐相处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体现在现代建筑设施和交通体系上，也不仅仅是产业和经济功能的发挥上，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公平的机会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着文化的归属感，充满着美好的追求和愿景。在西方的城市文化语境中，从亚里士多德到芒福德，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构建到对“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践探索，从对“后工业社会”的认知到对“低碳城市”建设形成的共识，无不体现了人文层面对城市本质的孜孜探求。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人本价值观从来都不应该被忽略，人的创造天分更应该在城市的空间里得到尽情展现，但前提必须是机会均等、制度公正和环境包容。

立足国内，我们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漫长城市化进程相比，可以称之为“压缩型”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使人口与土地两大红利集中释放，培育出了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使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50%，一批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得到提高。“城市中国”的内涵深化，不仅仅是整体的城市化率提升，更体现在大中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现代化的创新推进上。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现实挑战，那就是城市在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却是城市空间的越来越非人性化，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异，“城市病”集中爆发。随着城市化的制度变迁，

财富的集聚和分配形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加速分化，所形成的固化的利益格局，使城市中的大多数后来者失去了公平的竞争机会，造成了城市社会心理的阶层对立甚至对抗，城市文化的正向引导作用明显减弱。无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的发展，固然要以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为主线，也要同步推进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方式的变革，即通过大力度的制度创新，来推进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形成每个人都充满精神活力和归属感、幸福感的城市文化。

面向未来，中国的城市，应该是每一个城市人的幸福家园，“城市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追求，更是一个动态的推进过程。“城市中国”不是农村的边缘化，而是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城市中国”不是造就一个个“巨无霸”的水泥森林，而是区域协调、生态为基的城市群、都市圈有机体系；“城市中国”不仅仅是高收入者、精英人士和成功者的乐土，更应满足普通民众、草根阶层快乐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这一切的追求，都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制度环境上，让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能实在、真切地感受到并直接受益。实际上，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注定带来新的利益冲突，本质上都是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关键是利益分配要均衡，“议程设置”要“程序公正”，而不是强者对弱者利益的侵害和剥夺。城市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打破旧平衡、再造新平衡的过程。在“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的过程中，必然也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博弈，是各种有形和无形利益的再分配。科学、有序地推进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需要效率，更需要公平正义，即保障各方利益在城市空间中的均衡，以使城市在自身的发展中保持平衡，以免在快速运行中，特别是在“弯道超车”中出现失衡，而导致无法弥补的“病症”，甚至坠入令人扼腕的发展陷阱之中。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回望过去 30 多年的中国城市化历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快速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在感佩其创造出伟大的奇迹，在速度和效率上谱写了新的篇章的同时，更有必要对已经开启新一轮城镇化征程的“城市中国”，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言，那就是要打破对以往的“路径依赖”，创新城市的发展方式，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同时，更要注重公平正义，注重包容和谐，让每一个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均等的机会、发展的红利，形成维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包容精神，即在“动态的平衡”中来推进有质量的、惠及所有城市人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行动。“动态的平衡”，是在转变发展的主线引领下展开的，更要在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保持均衡，否则就会出现“失衡”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历史的演进、城市的发展，始终是靠公平正义的力量去打破旧有的平衡，创造新的平衡，并以“衡言”、“衡仪”来促进均衡，校正失衡，形成发展的周期律。历史的阶段性、城市的生命周期等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因此，在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转型发展中，把握住“动态的平衡”，前提是要认清其内在规律和外在形式，否则就难有“衡言”、“衡仪”，美好的初衷就会被不断变化的“城事”纷扰，实践探索也就会因失去战略的把握而走偏方向。

在中国文化的语义中,“衡”字既有秤杆、天平的本义,还有“把握”、“评定”的深意,呈现为“势”与“道”的哲学意蕴。学者立言追求“衡言”,治国者的法规制度强调“衡仪”。“论衡”的经典名著,古代有“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的王充《论衡》,近代有“解说简明,字理湛深”的章太炎《国故论衡》,都体现了客观、求真和警世的“衡言”追求。由此,作为一直记录和研究我国城市化战略、城市转型升级过程的学者,我也受此立“衡言”的写作态度的启示,将笔者在进入21世纪的10多年来所撰写的多个主题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课题报告、深度采访以及学术论文,选择了一批比较有代表性的篇什分类编排,汇成了这本《城事论衡》。当然,必须声明的是,这些无论是立意还是写作水准,都难以称为“衡言”,之所以借名“论衡”,只是想表明笔者对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认真态度与使命感,而“城事论衡”,要传达的则是这10多年间,笔者从记录中国城市化、城市发展的媒体记者,到转身为研究城镇化战略、城市转型发展以及城市文化变迁的社科学者,来深入探讨“城市中国”的大事件、日常变化和新现象、新问题的思路轨迹,并由此映照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推进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与企业国际化等重大战略中的“历史镜像”。鉴于其中的文章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媒体以及《现代传播》、《城市问题》、《江海学刊》和《南京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刊发后,曾产生过一定的反响,并且部分内容已在我这10多年间出版的《WTO与城市热点》、《商业新业态:城市消费大变革》、《创意与传媒》、《优化之道:城市新产业空间战略》和《中国速度:ECE样本》等著作中有所体现,自认有一定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故对这些文章按照主题和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有的还作了微小的改动,将全书分为“战略定位篇”、“产城互动篇”、“创新驱动篇”、“文化传播篇”和“企业竞争篇”五个篇章,力求体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框架,以进一步丰富我国城市研究的学术话语,也希望借此能起到“以已知验证未知”的效果,为我国的新一轮城镇化战略推进和城市转型升级行动,更加注重把握好“动态的平衡”,起到对实践创新的启示作用。

“城市中国”,开启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呼唤更加科学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战略。未来20年,我国仍将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主导下的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城市群的功能升级,将成为更有挑战性的课题,从土地的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创新驱动将直接体现为城市的包容性与文化魅力。可以断定,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行动推进中,“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的实施,将使创新型企业、服务型政府与充满活力的城市人,合力描绘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图景,书写出更多有价值的“城事论衡”新篇章!

作者完稿于2013年2月8日龙年除夕

目 录

序言 城市中国：城事“论衡”

战略定位篇

- ◆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003
- ◆ 我国城市空间优化的战略思考 /007
 - 链接1 对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新认识——兼评《优化之道：城市新产业空间战略》 /011
 - 链接2 城市产业空间优化：南京该如何选择？ /016
- ◆ “大事件经济”：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019
- ◆ 放大空间位势 提升城市能级 /025
- ◆ 合力构建“区域总部经济名城” /028
- ◆ 科学提升城市空间的“经济密度” /030
- ◆ “门户城市”的建设路径 /033
- ◆ 城市化不应是“农村边缘化” /036
- ◆ 中国城市产业空间的三次变革 /038
- ◆ WTO与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044
- ◆ 宁合昌“新三角”经济区战略构想 /053
- ◆ 城市空间与住宅空间的价值选择 /064

产城互动篇

- ◆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战略引领与路径突破 /079
- ◆ 新产业价值链与城市空间重组 /089
- ◆ 现代服务业：城市转型的新动力系统 /098
- ◆ 探索服务业引领城市转型的“江苏路径” /107
- ◆ 保增长，也要“腾笼换鸟”——推进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思考 /114

◆ 商业业态升级与商业地产转型	/118
◆ 商业业态的“沃尔玛化”与“反沃尔玛化” ——中国城市商业新业态的战略选择	/124
◆ 南京都市圈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审视	/131
◆ 都市圈呼唤共塑汽车业“价值链”	/141
◆ 中德产业发展比较及启示	/146

创新驱动篇

◆ “新两型”城市的建设理念及实现路径	/153
◆ 科技创新：南京的路径突破	/158
◆ 加快创建“创业人才特区”	/169
◆ 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联姻”	/174
◆ 打造“科技创新生态链”	/178
◆ 构建国际化的共性技术研发服务体系	/181
◆ “包容性增长”：增长的真义	/188
◆ 强化经济增长的“三民”内涵	/193

文化传播篇

◆ 国家传播形象的战略建构及实施路径	/199
◆ “创意时代”的新闻媒体竞争策略	/206
◆ “黄金一代”报业创新人才的培养策略	/216
◆ 超越“经济”，超越“年度”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有感	/220
◆ 华尔街风暴：媒体的“大考”	/222
◆ 当代新闻学的创新性成果	/224
◆ 南京城市文化形象的定位与标识选择	/228

企业竞争篇

- ◆ 中国企业：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 /241
- ◆ “中国新速度”：呼唤新商业文明 /245
- ◆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生命周期 /254
- ◆ 新苏商的历史“镜像”
——《光荣与梦想——苏商崛起》序言 /262
- ◆ 集成创新：“开”向世界的浦镇车辆 /266
- ◆ 用互联网将“中国制造”造福世界 /272
- ◆ 创造民族品牌的卫星通信系统 /276
- ◆ 打造软件业自主创新的“新模式” /280
- ◆ 走向理性：商业地产“大转型” /283

后记 /290

战略定位篇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城镇化与国家的工业化相伴随，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越50%，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十二五”时期，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把城乡产业互融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必须直面城乡之间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理清发展思路，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释放出城镇化的巨大增长动力。

首先，受城乡二元结构等长期因素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优质的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和聚集，在“减少农民”的同时也边缘化了农村、弱化了农业。无论从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看，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让各种生产要素在“下乡”和“进城”的过程中得到优化配置，实现城乡产业在空间上的对接和互融。城乡产业互融发展，追求的应当是城市、郊区、郊县及至周边农村的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以往一些城市缺乏战略眼光，在大部分时段内被动地进行城市产业的单向拓展，造成产业布局上的同质化竞争。还有的地区为提高城镇化率，不顾自身经济发展实际，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行“户口城镇化”。这种做法虽然在地理上扩展了城市范围，增加了城市人口，但由于城市经济总量偏小、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公共配套设施缺位，其结果是失地农民变身失业人员，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加大，反而影响城乡要素资源的

合理配置。

其次，多年来在行政管理上形成的以 GDP 为主体的政绩考核办法，使我国难以在城乡之间实现商品市场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导致绝大多数地方城乡产业分割。在理论上，资源要素按市场规律流动是城乡产业互融发展的前提。但是，长期以来，在层层经济指标考核压力下，即使是同一个城市，在产业发展上更多考虑的是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非全局利益、长远利益。这必然导致各地产业同构化，很难形成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 and 比较完备的产业链，不仅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例如，由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同性，加上 GDP 的考核压力，不少地方简单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或城市功能提升，结果却造成了企业短时间内的二次、三次搬迁，甚至连近 10 年规划建设的新城区、开发区，也因与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规划相矛盾，不得不加入“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的潮流中，其发展的代价是巨大的。

再次，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城市规划、轻乡村规划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在产业布局上重点突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影响着城乡产业在空间上的对接和融合。在我国城乡规划中，行政主导特征显著。依靠行政主导，可以加快城镇化进程，加速城乡产业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一味地依赖行政主导，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容易导致地方领导片面追求表面政绩，助长粗放型城镇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本来应该由产业发展推动的城镇化，变成行政手段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无论是城市用地还是农村用地都非常宝贵，因而紧凑型的集约化增长方式才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科学的规划理念引导下，加快建立起城乡产业互融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在扭转城乡不平衡发展局面的同时，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践诺善待城市和乡村每一寸土地的“空间责任”。

二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不仅要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实现突破，更要高度重视推动城乡产业互融发展，彻底打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整体上优化城乡产业布局。

世界经济经验表明，城市和乡村在工业化带动下，只有融合为一个整体，各种资源才能得到更加高效的开发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以城乡产业融合来推动城乡一体化，有助于在中心城市、新城区、近郊区、都市发展区以及远郊区等不同层级之间形成“坡度”，填平长期以来由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鸿沟，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均衡发展。

实际上，以产业融合来推动城乡一体化，体现了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

型城镇化战略。即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和建设,以工业化推进城乡资源和产业的合理聚集,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注重区域协调和社会公平,确保城乡居民拥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与传统城镇化道路比较,我国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在城市圈层之间通过实施产业集聚和合理分工,彻底打破了局部地域的城乡界限,从而促进了产业布局的优化和区域发展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以城乡产业融合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其本质内涵就是决不能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加快城镇化进程,而是要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

具体到一个区域和城市,只有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聚合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才能促进城市要素资源集聚,实现郊区、郊县和邻近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界限和发展落差。从当前各地实践看,推动城乡产业互融发展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下的整体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随着各地产业空间布局的不断调整和优化,不仅能减轻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可以通过土地集约利用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收益,加快培育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效应。这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

近年来,我国城市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正在由集聚转向扩散,多数大中城市具备了辐射带动周边大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使得郊区、郊县的土地和生态价值突显,城区、郊区、农村的区位价值落差日渐缩小。我们要在准确把握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理念,切实建立起城乡产业互融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城乡一体化道路。

一是准确把握我国城镇化的阶段性特点,着力突破城乡之间存在的户籍等制度性界限,促进城乡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回顾我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道路,城市的空间扩展是单向的、粗放的,对农村实施的是“侵入”式的“空间并构”。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有效的产业空间转移,依据产业价值链来进行产业分工和载体建设,走“分散式集中”的路子,不仅可以找到诊治“大城市病”、“大城市周边贫困带”的药方,也有助于促进城乡产业的合理布局。当今世界,以现代交通体系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的新产业体系,可以超越城市本位在大区域、都市区或城市群的空间中进行要素整合与资源配置,各类产业沿着产业价值链就可以互相延展和深化。由此,在产业空间布局上,大城市要敢于打破产业发展先城区、次郊区、再郊县的老路子,以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为目标,根据生态承载能力来规划产业发展区域,提高城乡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要敢于突破城市本位观念,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空间里,按照不同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特征,实现城乡要素资源的低成本集聚与整合,并借助文化认同等地缘优

势，合理布局特色产业，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二是积极创新农村用地制度和市镇建设体制，充分释放农村土地资源的空间价值，培育城乡产业融合的新动力。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了城乡一体化规划和新阶段。从产业空间布局来说，在一个城市范围内，以统一的土地利用为基础，合理划分工业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活区、商贸区、生态涵养区等功能区，使城乡产业发展在空间上互相衔接，有利于在集约利用土地的基础上优化环境，提升区域的总体竞争力。但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别，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后，往往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当地产业的发展难以形成有机联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产业发展相互脱节。而推进城乡产业互融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整理为城镇建设提供用地保障，满足现有城市产业升级和转移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使农村的种植养殖基地就地升级为产业加工区，打造特色地方农产品品牌，形成连接城乡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在此基础上，各地应以统筹城乡产业一体化为目标，积极引导城乡产业在空间上的持续重组和合理布局，尽快改变过去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单向产业发展格局。

三是加快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把推动城乡产业融合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同步实现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在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其实质是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问题。而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直接表现为各类产业在城乡空间上的合理布局，会使相当一部分产业和企业发生转移。进入新世纪，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尽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现行以 GDP 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其知易行难。我们更应看到，由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经济形势变动已经基本企稳，从企稳到繁荣这个比较长的“后危机”时期，正是我国从战略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成本最低的机遇期，同时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佳时机。因此，我们要尽快制订与科学发展观对接的经济发展考核体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落实到具体的步骤与工作程序上，加大在大区域或大城市范围内进行城乡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引导，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高效农业在整体产业布局上的引领作用，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原刊《求是》杂志 2012 年第 14 期）

我国城市空间优化的战略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中国不仅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8% 上升到了 2006 年的 43.9%。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财富、技术和服务从分散走向集聚的过程，也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变革的过程。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既是一个大国发展内生动力驱使的结果，也得益于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外向推动。毕竟，从世界城市化浪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发生在欧美完成两次城市化之后的第三次城市化高潮，中国可以充分借取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的经验教训，通过先行制定并科学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用比发达国家低的发展成本获得最大的综合收益，如城市和区域经济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的优化组合，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而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进入“十一五”，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从量的扩展转变为质的深化，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空间成为城市化区域发展的共同追求。

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城市化率在 30% ~ 70% 的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率达到 50% 就进入了“城市社会”。中国 2007 年的城市化率大约是 45%，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期，并即将进入“城市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承载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意味着城市将代表国家探索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新挑战的解决方案。而审视当前世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新浪潮，就会发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合理疏散以及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布局如何优化的新问题。进入 21 世纪，世界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以及金融资产的快速流动性危机，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但地域之间、国家之间以及城市之间，以利益共享经济全球化为纽带，

以一体化的“地球村”为空间依托，携手出台了很多得力的措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源节约以及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绩。走绿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共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秩序，使全球城市的极化发展与均衡发展相得益彰，并构成了以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串起的全球城市体系，世界级城市、跨国城市、国家级城市以及区域级城市所构成的新型经济网络，控制了世界经济的命脉以及阶段性走向，少数世界级的节点城市在空间权利上超越国家实体，跨国公司也以国际节点城市为基地进行持续性产业转移，并由此带动着世界资本的流向。这种新型的、不平衡的世界城市竞争体系的确立，使发达国家的全球性城市，可以稳步地站在国际产业的高端位置和世界经济的制高点上，同时也容易造成已经进入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被边缘化，使这些城市因为从属性较强、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难以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但是，在这个动态的、非均衡的体系中，城市的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信息革命带来的资本、人力等要素流动的快速扩散性，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可以迅速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形成自己的技术扩散源，并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的地位和价值，不仅仅体现为创造的经济总量，也体现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所处的空间区位上，体现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环节位置上。近年来，跨国公司实施的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了原来直接的设备、技术的转移模式，把服务业跨国投资和服务外包作为主导的转移方式，也是顺应新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变化的理性选择。

只有站在全球城市体系的认识平台上，来审视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重要地位，才能认识到中国的城市融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重要意义，才能认识到中国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如何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道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是世界瞩目的大事。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交通、居住、产业发展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负效应。特别是以“土地城市化”政策驱动的城市增长方式，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2005 年，我国人均建设用地为 130 多平方米，但同期的发达国家为人均 82.4 平方米，发展中国家为 83.3 平方米。我国的单位 GDP 能源消耗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按 GDP 汇率法计算，尽管从 1993 年到 2003 年间，我国每万美元 GDP 能耗由 26.3 吨标准煤降到了 10.7 吨标准煤，但 2003 年的 GDP 能耗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2.2 倍，比美国高 2.3 倍，比欧盟高 4.5 倍，比日本高 8 倍，比印度还高 0.3 倍。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如果仍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坚持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收益、高污染低环保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